

《光明日报》国学版丛书

國學 精華編

梁
枢
主
编



《光明日报》国学版
创刊五周年纪念

《光明日报》国学版丛书

國學 精華編

梁 枢 主 编

 商務印書館
The Commercial Press

2011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国学精华编/梁枢主编. —北京:商务印书馆, 2011

(《光明日报》国学版丛书)

ISBN 978-7-100-08287-7

I. ①国… II. ①梁… III. ①国学—中国—文集

IV. ①Z126.27-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062795 号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光明日报》国学版丛书

国学精华编

梁枢 主编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100710)

商务印书馆发行

北京市白帆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ISBN 978-7-100-08287-7

2011年8月第1版

开本787×960 1/16

2011年8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张30½

定价: 52.00 元

國學

中石題

告读者

原载：国学版（光明日报2011.1.10第15版）

今天，是本刊五周岁的生日。五年前，我们在国学版的创刊号上，刊载了一则“告读者”。五年后的今天，我们把这段文字再度刊出，以志纪念。也以此方式，向五年来不断给予我们关爱的广大读者、作者表示衷心谢意。同时，在这个特殊的日子，我们向生前对本刊曾给予亲切关怀和指导，五年间先后辞世的朱伯崑、孙以楷、肖蕙夫、任继愈、卞孝萱、丁冠之、范敬宜等国学学者表示深切的怀念。

国学是中国人的精神家园。这个“家”很大。它不仅凝聚了五千年的文明历史，也将承载十三亿中国人的未来。经过一个月的紧张筹备，《国学》版从今天起正式推出了。我们愿和广大读者朋友共同品味在“家”的感觉。（2006年1月10日）

序

许嘉璐

《光明日报》国学版，今年五岁了。五岁之于人，还是儿童，但语言能力已经接近成人。“国学版”似乎就像一个人：虽然年岁不大，但却很善于表达：叙说了五年来国学的现状，包括国学复苏的态势、趋向、困惑和喜悦。国学版和商务印书馆合作，编辑了《国学精华编》和《国学访谈录》，在我看来，恰似是为贺其“大”寿而准备的鸡蛋或蛋糕*。

两本书里的大部分文章在发表时我就读过，受益多多；为写这篇序，日前又把两本书的样稿通读了一遍，感觉又有所不同：但觉满目琳琅，异彩纷呈，大家云集，新秀蜂出——这是《国学》五年来蹒跚、健步和跨跃的浓缩展示。

近年来，《国学》在争辩声中渐渐复兴。这实为势所必然。“国学”——暂且把对它的内涵外延的不同意见放一放，仅就对其认识的最大公约数而言——之复兴，是民族的需要，是追求“非物质”、“非肢体”享受者的需要。因为非物质的精神和信仰，犹如空气和水，人人须臾皆有，时时不得离；而作为民族文化的核心，从来是代代相传，难以中止，又与时俱进的。所以任继愈先生说：“这种文化的继生性特点对于一个国家和民族来说是无法否认的。没有传统就没有今天，大家都是在旧文化基础上建设新文化。”（《精华编》2页）现在我们正在努力建设社会主义新文化，自然缺少不了传统文化的营养和经验；甚至可以说，如果以“国学”为根本标记的传统文化为中国多数人所生疏，就等于没有牢固的地基却要建造摩天大厦。眼下“国学”之所以在国内微热，不是哪个或哪些人“掀”起来的，而是“当春乃发生”的。

对“国学”以及《国学》有所争议，也是势所必然。从上个世纪初“国学”一词出现之时起，围绕着它就出现了不同声音；尔后曾经消停了很久，那是因为它在中国大地上已经没有了踪迹。现在之复

序

001

*我家乡的俗语说庆祝生日，“大人一顿饭，小孩一个蛋”，这里即取此意。

出，是耶，非耶？福与，祸与？此乎，彼乎？都成了研讨争辩的内容。何况“国学”此词此事于此时重现，既是历史的延续，从一定意义上说，又是个新事物，起码对许多年轻人来说是新的概念。凡是新事物，无论其性质、作用，还是应有的方式、方法，都有很多未知，仁智之异自属当然；国学既有重出的一面，则旧有的歧见势必随之被重新拾起。

这是好事。说明人们，至少学术界的人们关注它了，思考它了；所有的意见都对从事这一领域研究以及关心它的社会人士有所启发——便于人们从正反、两侧、上下、古今、内外多个角度审视反思。看看现实，近些年国学不正是在争辩声中前进成长的吗？当前国学之“热”，就是在种种意见的纠结中一点点地探索，一步步地创造着“创造之路”，在磨砺准备异日收割庄稼的镰刀。其间有对过去的回顾，有对当下的深思，有对未来的预测，这从一个侧面体现了中华民族对于文化的自觉、自信和自强。

当今对国学的思考虽然和上个世纪初有许多相似之处，但“语境”却已经有了很大不同。相似者，都有一个中西间的交流、比较和融通，古今间的继承、发展与弘扬以及这两组关系纠缠在一起的问题。不同者，昔日国家积弱积贫、痛感自家落后的舆论为主流，而西学的弊病其时尚未充分显现，因而呼唤树立民族文化主体性的声音微弱；今天的交通和信息传输速度为一个世纪前所不敢想象，内外研究成果和普及读物可称海量，但也优劣真假混杂；当时所谓的传统，专指自先秦以迄明清的文化积淀，百年来，中华儿女已经用汗水和鲜血铸就了近代的传统，另一方面，20世纪西方对自己文化的反思也成潮流，因而古和今、中和西两组四项的交叉也较昔日复杂得多；研究国学所需要的基本而重要的工具，如“小学”，当年几乎是学人必备的基础知识和技能，而今早已成了翡翠“手件儿”，不但研究者理解与诠释典籍急需之，而且“小学”本身也急需充实发展；……

过往的五年，是未来的基础和起点。《国学》专刊创办，《光明日报》之功巨矣；瞻念未来，难处不会略少。国学下一步的困难就是《国学》的困难。我相信所有关心它的人们会与之同心，一起知难而进。

在我看来，未来的困难不仅仅在于学术水平的提高需要时日，普

及既需从上到下逐级进行，更将旷日持久，而且在于国学身处上述的当代语境需要回答一系列世界性难题。恐怕起码以下几点是未来五年首当其冲的：

1. 国学的发展、弘扬、复兴，一要深入研究，二要生活化，因而只有学者的自觉是远远不够的，最需要的是社会的“自觉”。只有当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内化于全国人民的心里时，国学的力量才能显现出来，为全民所珍惜捍卫，民族才能立于不败之地。一方面，需要学者关注社会，关注普及，关注民心（这也是古昔之“士”的必备品格）。只有学者的自觉才有社会的自觉；只有社会自觉了，方有学者的广阔天地。国学的纯学术化是可怕的，是违背国学的本质特征的。另一方面，国学的一些内容需要逐步进入学校教育体系，此事之难不言而喻。为此，我们再花上十年的力气行不行？

2. 香港中文大学的刘笑敢教授说：“中国跟西方接触以来，在很多地方已经西化了。我们的大学体制是西化的，我们的学科分类是西化的，我们的思维方式已经受到了数学、物理、化学的影响。在这个意义上，或在潜意识、无意识的意义上我们实际上没有办法避免用西方的思维方式或西方的思维概念来观察思考中国哲学或中国文化中的问题。”（《访谈录》156页）所以有的学者就哲学问题分析道：

“中西哲学是两个不同形态的哲学。我们不能因为没有西方以知识为中心的哲学就妄自菲薄，认为自家没有哲学，更不能用西方背景下的哲学观念硬套中国固有的哲学。哲学本无固定的形态，不同的文化背景凸显不同的哲学形态，而哲学自身也在发展变化。我们当下的工作是在现有的语境下深入挖掘中国特有的哲学智慧，而不是跟在西方哲学的后面亦步亦趋，随便比附。否则，我们将无法使我们中国传统哲学所蕴含的广大精深的智慧开显出来。”（《精华编》393—394页）

这两位先生的话触及了当前国学研究的关键问题之一。任何民族文化，总是从与异质文化的接触、冲撞和相互吸收中获得前进的动力和营养的。在这过程中关键是要有自身文化的主体性。在几乎完全被动，被强势文化压得抬不起头，因而多少带些盲目性时，如果思维没有浸透自己文化的核心（宇宙观、方法论等）并通观人类历史进程，就难免穿着高跟鞋扭秧歌，按咏叹调的旋律唱《打龙袍》。但是，要做到“避免用西方的思维方式或西方的思维概念来观察思考中国哲学

或中国文化中的问题”，不比附，就需真正深入到中国传统文化——国学中去修养心性，而并非把传统文化——国学只当作谋职求生的手段。要走到这一步恐怕也需要若干年吧。

3. 在地球变得越来越小的当代，国学如果只是在中国境内“热”，哪怕已超出了学界范围，恐怕也还不能说是复兴了；我认为，只有在国学真正成为世界学术界显学之一时，才能算是“热”了，也才能说是复兴了。国学必须走出去，因为我们自信“中国特有的哲学智慧”可以成为世界多元文化中重要的一元，可以为世界走向和谐做出贡献。因此在研究和普及国学的过程中，无可回避的几个关系到世界未来发展道路的问题便提到我们面前：

经济发展的速度是不是越快越好？为了保障人类生活得幸福，经济发展需要怎样的速度？

经济的全球化和文化的民族化应该是怎样的关系？与此相关的是，人类的物质享受和精神富足应该是怎样的“比例”？

自然科学发展的速度和人文科学研究的速度如何相称？制度（包括法律）作用于社会的力度和道德力量如何协调？

遍及全球的价值混乱、环境恶化、恃强凌弱，贫富差距拉大、社会动荡不安、国际冲突不断等问题的根源是什么？国学研究的成果怎样才能转化为促使世界安宁的力量，人类怎样才能幸福？

国学的研究一向基本着眼于中华民族自身的现在和未来，所以对这类问题很少涉及，而它一旦与世界其他一些文化相遇，就不能仅限于自我介绍、一般论说，必须针对当代世界的种种危机做出我们的回答。

4. 国学要走向世界，还有一个话语习惯转换的问题。不同民族、不同文化的表述方式、方法是有很大的差异的，有时相差还比较大。到现在为止，中国人看外国人的著作（原文的和翻译的）远远多于外国人看中国人的著作，欧美之不关心、不理解中华文化尤其严重，因此或许中国人看外国叙事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比较习惯了，而对方则尚未习惯我们的话语。这虽然是思想表达问题，并不完全涉及文化的内涵，但是却是这些年来中外交流中时时遇到、迄今还没解决的难题。人们常说中国学术在世界上的话语权太小，这除了政治、历史

等原因外，话语习惯隔膜的影响也不可小觑。须知，愿意接受“喜闻乐见”形式的表达，是人类的共性。

5.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前面所提到的“小学”是国学各个领域都必须具备的。如果说国学一些内涵的生活化需要相关内容进入学校体系，那么，在大学的人文社会学科的教学则应该把文字、音韵、训诂、版本、校勘以及出土文物和文献的运用列为必修。这样，再过二三十年，国学领域的年轻学者在掌握研究的“工具”方面可以登上一层楼，从而对经典诠释的准确和开掘的深度必有巨大的提高。

《国学》五岁，于其“华诞”本应只说些恭喜恭喜之类的话，我却说了一堆前方的坎坷甚或泥泞，这并非担忧它的命运多舛，而是期望它眼界再宽些，想得更远些，和众多作者、学者、支持者一道，在未来，至少在今后五年做出更大的成绩。我对国学和《国学》是有信心的。

办好“国学”版 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

光明日报社总编辑 胡占凡

讲到国学，可谓说来话长。中华几千年文明沉淀在里面，其中既有中华智慧的珍宝，也有糟粕混迹其间。我们这里所倡导的，当然是优秀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可笼而统之。“国学”是中国固有的文化与学术传统，是中华文化在应对西方文化过程中逐渐成长起来的一种新型学术传统。近年来，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迅速提升与国际影响力的日益增强，“国学”日渐成为表述中国文化的“主词”。

五年前，在中宣部领导的亲切关怀和指导下，《光明日报》国学版于2006年1月10日正式创刊。国学版的创刊，与中国人民大学成立国学院、北京大学创办乾元国学教室，共同被视为新世纪中国大陆“国学热”兴起的标志性事件；五年来，国学版在光明日报编委会的领导下，依托广大作者与读者的信赖与支持，以认真学习的态度，及时反映当代国学研究与普及的新情况、新进展、新趋向，努力探索“新闻纸上办学术”的特色之路。五年来国学版共出版185期，总计160万字。呈现在广大读者面前的这两本书——《国学精华编》、《国学访谈录》就是从中精选，结集而成的。

国学是中国人的精神家园。而以“文化”为主打词的光明日报来做这件事再合适不过了。五年来，国学版以新中国成立以来主流媒体唯一的国学专刊的方式，客观地反映“国学热”，及时地报道“国学热”，全方位地观察“国学热”。从这个意义上说，国学版是“国学热”的一个旁观者。但是与此同时，国学版还实际地参与到“国学热”之中，成为“剧中人”——

2007年11月，国学版组织实施的《三字经》修订工程，引发了社会上对诵读经典、“四书”进课堂等问题的热烈讨论；

2009年4月，于国内率先开辟“解读清华简”专栏，赢得海内外学界的高度关注；

2009年12月，率先发起“国学”学科问题讨论，引发了包括有关部委、大学校长以及百余位学者在内的社会各界的持续关注；

2011年3月起，开辟“中国路径”专栏，实际推动中国文化、中国哲学于当代的“主体性”建构。

五年来，国学版赢得了广大作者的信任与读者的爱戴，成为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平台。

这两部书的出版，是对既得成绩的总结，同时又是走上新征程的起点。党的“十七大”提出“弘扬中华文化，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部署，这是指导我国进行当代文化建设的战略方针。《光明日报》以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为己任，继续办好国学版是时代赋予我们的责任与使命。今后，《光明日报》要进一步加强国学研究与普及工作的关注与报道，努力为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构建和谐社会提供用之不竭的思想资源。

对“国学”应做全面的整体研究

北京大学教授 汤一介

《光明日报》国学版创刊已经有五年了，它对推动“国学”的研究和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普及起了很好的作用，受到了广大读者的欢迎。对此，我们必须对编辑“国学版”的同志们表示感谢。

当前“国学”的研究与普及已成为我国社会各界的热门话题，但对它也有种种的看法和批评。甚至对“国学”能否成为一门学科也多有质疑。这里我想介绍一种对“国学”我比较赞同的看法。

1938年，马一浮先生应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约，至该校讲“国学”，他说：“今先楷定国学名义。举此一名，统摄诸学，唯六艺足以当之。”“今楷定国学者，即是六艺之学，用此代表一切固有学术，广大精微，无所不备。”这个说法确有其独特见地。盖“六艺之学”为中国学术文化之源头，其后之学术文化皆源于此，而代有发挥，并在其间又吸取其他文化以营养之。这里也许可以特别注意的是马一浮先生用“楷定”说“国学名义”，而不用“确定”说“国学名义”，颇有深义。他说：“学问，天下之公，言确定则似不可移易，

不许他人更立异义，近于自专。今言楷定，仁智楷定，则仁智各见，不妨各人自定范围，疑则一任别参，不能强人必信。”盖学术文化最忌“定于一尊”，而以“百家争鸣”为好。马一浮先生之学术成就，正因其有海纳百川之胸襟，博通中西古今之造诣，而为世所重。

作为中国学术文化之源头的“六艺”，其中必有“普世价值”的意义。正如作为西方学术文化之源的希腊文化其中也有其“普遍价值”的意义。任何民族的学术文化都是在其特定的历史境界下形成，它都是有其特殊意义的文化，而学术文化的“普世价值”往往是寄寓于其“特殊价值”之中。既然学术文化之“普世价值”往往寄寓于各民族文化的“特殊价值”之中，就此意义说“六艺不唯统摄中土一切学术，亦可统摄现在西来一切学术”。（马一浮语）盖因“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也。人类社会所遇到的问题常常是共同的，人类对解决这些问题的思考往往也是大同小异的。因此，我中华民族当然就要由自身学术文化中寻求有益于人类社会生活的“普世价值”，别的民族文化亦可从其学术文化中寻求其“普世价值”。古云：“道并行而不相悖”也。马一浮先生说，弘扬“六艺之学”，“并不是狭义地保存国粹、单独地发挥自己的民族精神，是要使此种文化普遍地及于人类”。当然，我中华民族也必须认真地吸收、融化其他各民族文化中所具有“普世价值”意义的思想资源，这不仅有益于中华文化的发展，而定会由这种交流中都得以受益。

如果我们把“国学”楷定为“六艺之学”，也许有利于对中国传统文化有综合性地全面理解和更深刻的把握。这是因为，“六艺之学”所包含的内容可以说涉及文、史、哲甚至到要涉及政治、法律、经济等等诸多学科的内容。要真正了解中国文化的源头及其历代的诠释和发展，必须花工夫对它进行综合性的整体研究。例如五经中的每一经，它既是文学，又是历史学、哲学、政治学、经济学、法学等等，如要了解和领悟其中之总体真意，必须具备多方面的知识才有可能。不仅中国学问在一定条件下须要作综合性的整体研究，西方学问也是一样，例如“圣经学”，如果只对它分科进行，分成宗教的、哲学的、文学的、历史的、社会的等方面的研究，或可取得部分成果，却是很难综合性地整体把握《圣经》的真谛。

我认为，把人文学科、社会学科等分科进行研究是适应近代工

业化要求而有的，并不是自古以来皆如此。我国自古以来并未有绝对化的分科学术研究，其实西方在古希腊时也是如此，例如亚里士多德，他的书那么多，虽然可以从每个方面进行研究（例如哲学、美学、伦理学、逻辑学，等等），但要全面地了解亚里士多德思想，就必须进行综合性的多学科研究。

当前学术发展有一个重要的趋势，这就是跨学科研究，而对自中华文化的源头《五经》到历代对它的诠释和发展，其本身就是一种必要的跨学科研究，因此，我认为对“国学”的研究将会促进我们对中国传统文化综合性整体研究，进而真正把握中国文化精神之所在。就这一点说，大学分科过细，并不一定是大学必行之路。我认为，掌握多种学科的知识，通晓古今中外学术，很可能在学术上更具有创造性。

我看国学热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余敦康

《光明日报》国学版是在国学热中创刊的，而国学热的兴起是和中华民族文化复兴的宏观历史背景密切联结的。上个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刚刚起步，并没有出现国学热，兴起的是以电视剧《河殤》为代表的站在西化的立场批判国学的思潮。进入上个世纪90年代，这股西化思潮受到抑制，国学在学院派的范围内似乎显露出一点热的迹象，但是很快又受到主流意识形态的批判，认为国学封建复古，不应该提倡。到了21世纪，特别是2004年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正式提出在中国构建和谐社会的宏伟目标，几位文化精英也在这一年发表了“甲申文化宣言”，把开展国学研究以促进中华民族文化复兴提到构建和谐社会的高度来认识，这才澄清了一些思想障碍，为国学热的兴起揭开了序幕。作为一个标志性的事件，在建国以来的60年或者五四以来的90年中，国学热是直到2004年即甲申年才算是真正的兴起，至今仅仅延续了六个年头。

在这六个年头中，国学确实是热了起来，成绩不小，但是也有显著的不足。最大的不足在于缺少正本清源、返本开新的研究，为当

代中国构建一种得到普遍认同的主流文化，参与全球化的进程。比如2010年，由联合国发起的“世界文明对话日”首次在中国山东的尼山召开，在筹备这次盛会的高层座谈会上，吴建民先生坦率地指出：

“我们中华文化是什么，怎么能够比较简单地讲清楚。恕我直言，我们现在对外讲的东西，条条多，例子少，听不明白。我们中国存在一个构建主流文化的问题。主流文化，这是需要几代人下工夫来做的。主流文化没有建立起来，中国不可能长治久安。”如果国学热在世界文明对话的大背景下不能清楚明白地回答“我们中华文化是什么”的问题，不能为构建和谐社会提供主流文化认同，只是停留在整理国故的层次，既不关注现实，也不着眼于未来，这就失去了根本，热不了多久，很快就会衰竭的。

关于国学的两点看法

西北大学名誉校长 张岂之

“国学”一词渊源甚早。西周时，学校包括国学与乡学两个系统。国学指的是中央官学，乡学是地方官学，故有“学在官府”之称。先秦以降历代的经史子集的学问，都可归为国学。19世纪末，随着西方科技和社会科学大量传入我国，与这种“西学”相对的“中学”或“国学”，主要专指中国本土的学问。1925至1929年清华大学办“国学研究院”，所谓“国学”即指中国传统文化的整体（包括古代的自然科学）。这种意义上的“国学”一直沿用至今。

五年来，《光明日报》开设“国学”专版，传播新知，振奋精神，反映了我国传统文化研究和普及的进展情况，沾溉学林，为人瞩目，已无须赘言。这里，略谈关于国学的两点看法，既表对“国学”版刊印五周年的贺忱，也供朋友们批评参考。

一、“百家之学”是“国学”的优秀学术传统和特色

从表面看，“国学”广博而杂乱，难以捉摸，但实际上，回顾中国古代学术史，其演变脉络清晰可辨，其中重要的传统和特色之一就是“百家之学”。先秦诸子争鸣，彼此促进，形成了春秋战国子学与史学的繁荣；汉唐时期，儒道释三教融通，共同发展，开创了宋明

新儒学、新道家、新佛学的昌盛局面；西学东渐，中西会通，方兴未艾，促成了中华文化发展的新态势。

不同学派间思想的差异和融合，是学术繁荣和发展的生命，反映了相反而相成的学术精神与“和而不同”的文化观。清初，黄宗羲、全祖望撰《宋元学案》，以理学家为主干，但并不排斥其他学派的学者，如永嘉学派的陈亮、叶适，王安石新学，苏氏蜀学，强调不同学派的交流影响，相反相成，正如《明儒学案·发凡》所说：“有一偏之见，有相反之论，学者于其不同处，正宜着眼理会，所谓一本而万殊也。以水济水，岂是学问！”

“百家之学”培育和滋养了中华文化的精神根基和发展动力。受时代激荡，它也具有现实的关怀与精神诉求。如唐代中期经济与社会急剧变动，舍传求经的解经新风悄然形成，韩愈《原道》将“尧舜之道”与“周公之礼”融合起来，便不仅仅出于一种对儒家道统的认同，而且是对庶族与士族、淳朴无为与礼法清俭的现实与理想矛盾解决的尝试。总之，从中国古代文化自身发展的连续性与逻辑性来审视，犹如奔腾不息的大河。如果只有一个学派、一种观点，哪里会有丰富多彩的中华文化呢？

二、继承和发展前人在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上的成果，这是国学研究保持生命力的关键

历史上国学旨在“载道”、“明道”。《庄子·天下篇》和《史记·论六家要旨》评判当时的各种学术，均以见道的高下远近为根据。《明儒学案·序》主张学术史研究要努力反映各种学术体现“道”的曲折过程，“学术之不同，正以见道体之无尽”，学术虽有学派的不同，但都是“道”的体现。今天来看，不论在学术研究上持何种论点，只要是做出成绩的，几乎都在历史与逻辑的统一上有所贡献。没有脱离具体历史的文化，也没有无文化的历史。在历史与逻辑的统一上，今天的学者还有许多工作要做，衷心希望《光明日报》国学版在这方面多加关注。

国学研究与普及相辅相成。精深的专门的系统化的中国传统文化研究，有助于推进和提升国学知识与精神传播的水平；而科学严谨、生动活泼的国学普及工作，也有助于宣传和推广中国传统文化研究的新成果。

报纸上的学术文章要力求简明

清华大学教授 李学勤

《光明日报》国学版创刊迄今已五周年，这是一件非常值得祝贺和纪念的事。这几年来，我和众多学术界同人一样，每星期都在期待着读国学版。

在报纸上开辟定期的学术专版，是清末民初有了报纸以来一直持续的优良传统。不妨回想一下，在近代现代学术史上，有多少重要关键的成果在报纸上发表，有多少影响深远的讨论在报纸上展开。由于报纸出刊及时，流传普及，给了学术界很大的帮助。《光明日报》国学版在这几年“国学热”中所起重大作用，是大家周知的。

我特别喜欢读国学版上那些简短明快的作品。这使我想到，国学的一个重要传承，就是写简明扼要的学术文字。古远的不说，人人都知道的顾炎武《日知录》，王念孙父子的《读书杂志》、《经义述闻》，真是言简意赅，绝非所谓“短钉”文章可比。近世许多位大家，所撰之作也是如此。

学术论著自然有长有短，应该以说明问题为度。列举文献史料，征引前人论点，也没有必要细大不捐，务求全面过细。这样，不少长篇大论的文章，就可以缩短，适合在报纸的专版上刊登，而且不降低内容质量。

因此，希望《光明日报》国学版发扬学术专版的特有风格，多发表短小精当的研究讨论文字，进一步推进国学的建设。

“国学”和“新国学”

华中师范大学教授 邢福义

《光明日报》国学版的创刊，有如一石击出千层浪，引起了学术界、教育界以及社会各界众多人士的高度关注。对于一门学科来说，五年时间太短了。然而，就这么五年的时间，“国学”这一概念却已经得到了令人惊讶的历史性发展。